

青年说

9月2日，第二届“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·年度特选作家(2022—2023)”入选名单在北京揭晓。青年作家薛超伟、大头马、三三获选本届“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·年度特选作家”。第二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“新文化与新时代青年写作”主题论坛次日举行。特选作家薛超伟、大头马、三三在论坛上阐述了他们各自对于文学、创作、时代等的看法。

—编者

写作对我来说就像是在解题

大头马



说来惭愧。这几年我写作很少，通常一年只写一个短篇或很短的中篇，几乎都是来自《小说界》的约稿。我喜欢给他们写稿，因是命题创作，像解一道数学题。我是理科生，读书时最擅长数学。写作对我来说就像是在解题，只不过大部分时候是自己给自己出题。这几年，我开始失去给自己出题的欲望了。有我的原因，我想也有外部的原因。想不出还有什么有趣的题目，便只好写别人出的题。这使我轻松不少，也不失乐趣。和解数学题不同，解数学题的追求是最优美、最简洁、最清晰。“两点之间，直线最短。”写作则千变万化，这便是写小说的自由。写小说可以很自由，但它不意味着没有难度。自由与难度相伴相生，且并不是此消彼长的简单关系。这说得太空。确实，这两年我写得少，但看得多，思考得更多。多数时候我在阅读，更多数时候，我在生活。

我有时参加一些会议，会发现我听不懂批评家在说什么，批评家也不懂我在写什么，大家在用不同的一套话语系统。这时我只能讲故事，讲故事大家都明白了，可以对话了。时常还会发出一些笑声。这本身很能说明一些问题，比如小说是什么。如何读，怎么读；如何写，怎么写。实际上，你越钻研，越会发现小说如同宇宙的诞生。我们了解得还不多。而很多有关小说的认识，也并不是来自小说本身，而是来自与小说看似无关的其他一切。因此这些年我的主要时间就是在了解我所不了解的其他一切——与人有关的、与物有关的、与抽象有关的、与时间有关的。

我的成长轨迹和一般人不大一样。在求学阶段，我与学校的关系疏离，与社会的关系密切。很早就进入了(我想象中的)社会，结识了一大群成年的朋友。我生活的重心就是在网络或现实中与这些朋友来往。这也构成了我的主要写作来源和发生场域。同时我在报社长大，除掉在学校的时间，几乎都待在报社，报社的每个人我都认识，我常待在新闻热线接线室，有时还帮着接听电话。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，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。

但是等到我大学毕业，真正进入社会，我却发现自己不能适应真实的社会了。我有过几份工作，均以不到一年时间提交辞职信结束，总共算起来大概也就两年多时间。这之后，我与社会的联系开始逐渐淡化，直至脱节。当然，仍然在工作，以写剧本为生活来源。但这份工作不需要和社会打交道，主要是和甲方打交道，其余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待着。业余时间便用来写小说，聊以游戏。这样写了若干年，也觉得无趣起来，直到为写一桩十年前发生在老家的谋杀案，才又和社会打起了交道。

我在刑警大队陆续待了三年时间。每天都要和无数人无数突发事件打交道。有活人，也有死人。更多的是关系。警察与嫌疑人的关系，嫌疑人与受害者的关系，警察与警察之间的关系，上下级关系、辅警与民警的关系。我与所有这些人的关系，有时旁观，时而介入，偶有被卷入。这份工作极大地缓解了我写作和生活的焦虑，并且极大地激发了我对真实社会的了解欲望。在我工作的辖区，我开始学会像一个老警察那样，对街道的每一间店铺、店铺的老板是谁、哪间棋牌室逢周五休息、哪座写字楼常发生扰民事件，所有这些空间、人物、事件的细节了然于胸。我开始知道接警之后走哪条路线能最快到达现场。“两点之间，直线最短。”这是另一种数学。

后来又搬去了南京，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做了一年饲养员。这份工作看似与刑警千差万别，远不如前者惊心动魄，但它包含另一套极其丰富的知识体系和实际经验。这是一个更为广阔得多的世界，因为这份工作，我开始学习动物学、植物学、生态学等各种庞杂的博物学知识，并且这些知识都是在实操的过程中习得的，而且绝不能掉以轻心，因为你的每一个行动都与别的人会呼吸的生命有关。你会开始意识到世界是一个万物循环链，人类只是其中的一环，并且是最具破坏力的一环。如同蝴蝶效应。你所做出的每件事，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反馈到你自己身上。

这就是这几年我的主要生活。它们都和写作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和我将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密切相关。而我一直认为，一个人能写出怎样的作品，实际上是由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所决定的。过去的一年我出版了两本书，一本是旅行写作作品《东游西荡》，它写于2016至2018年，只是拖延辗转许久才得以出版。出版时疫情已近尾声，这本书的出版便显得百感交集。不过，它仍说明了那几年我与世界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幅图景。现在读，更像幻境。另一本则是最近刚刚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《国王的游戏》，这本书是我2017至2022年的中短篇小说合集，其中半数与游戏有关。我并非一个资深的游戏玩家，但从小到大也玩了一些具有时代代表性的游戏。一开始，我只是在构想如何将游戏文本与小说文本进行结合。后来，我开始意识到当一些现实故事不能被直接讲述时，我可以将其建构为游戏——另一种虚构文本，发出与现实逻辑基底一致的声音。

——回到这篇文章的主题，新时代、新文化、青年写作。关于这三个词，我都谈不出什么形而上的东西，只能以上述我自己这几年的生活与写作作为一个样本供参考。希望能对大家以及间接影响到的各种动植物、海洋与页岩、银河系与黑洞有所启发。

中国的青年是有伟大创造力的

薛超伟



现在是个很好玩的时代。青年尤其网络上的青年，具备解构一切的能力。大部分时候，他们都能找到快乐。即使暂时陷入困顿，也能苦中作乐。他们打开网络，就可以进入创造的场域，虽然每天的信息迭代很快，那些创造也很快被遗忘，但是几乎每天，都有新鲜的创造在生成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他们利用狂欢去抵御荒诞。一些特别无厘头的短视频作品和一些所谓的“发疯文学”，都在模拟某种非理性的状态，去呐喊，去批评。这令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，想起《巨人传》这些著作，戏谑的，狂欢的。我觉得这算是新时代人文精神的一个表现。

前阵子的热门话题是，人工智能会不会替代文学。其实在AI写作出现之前，海量的文字创造就在网络上发生。每天在网络上涌动的创作热潮，尚且很少进入文学评论的视野，现在去谈论人工智能是否会代替文学，为时尚早。事实上，新的创造力跟创造形式与文学是不相悖的。文学有强大的生命力，它可以一直改变自己的形态，去适应新的时代主旨。时代需要诗歌，文学就繁衍出诗歌，时代需要戏曲，文学就繁衍出戏曲。只要人类的创造力存在，文学就不会消亡，它不会被任何新技术驱逐。技术只会放大创造力，而不是替代创造力。而且，新技术从来不是文学的敌人。我对新时代的青年写作，抱持着非常乐观的态度。

中国的青年是有伟大创造力的青年。在这样一个时代，中国青年过着一种与传统完全不同的生活。青年一打开互联网，就能见到最神奇的景观，最奇妙的建筑，最美好的人生。经常有人痛心疾首地问：为什么现在的青年、少年要做低头族？为什么他们这么依赖网络？因为，网络好啊，网络上有许多好的事物。

传统的观念认为，我们要少上网，少沉浸在虚拟的生活中，尤其是作为写作者，要多观察、多体验我们的现实生活。但其实新时代的青年，给自己创造了一种分身，现实里有一个生活形态，网络上也有一个生活形态。要问哪个是真的，答案是，两个都是真的。所以，可能反而要多上网，我们才能对当下青年的真实生活有一个更全面、更“现场”的了解。

比如，现在网络上引起共鸣很容易。一句“家人们懂懂”，后面就会接出一段非常有共鸣的话。当下每时每刻都在诞生庞大的共鸣，青年在网络上制造了一个自己的言论空间。所以他们在网

络上其实很容易形成一股声音，这股声音是振荡发聩的。

又比如，现在青年生活在网络上，其实也是追寻一种“自我匿名”的状态。他们渴望表达，在网络上留下了很多率真的言论。他们在表达的同时，又不希望被评判，所以他们又需要隐藏言论背后自己这个真实的主体，所以就出现了“momo”这个群体。“momo”最初是一些社交平台上注册账号形成的默认昵称，就是不取网名的网友，会得到“momo”这样一个名字。随着“momo”军团越来越壮大，很多本来给自己取了个性网名的网友，也将网名改成了“momo”。于是，像水滴混入大海一样，momo和momo彼此混淆，互相掩护，形成了当下互联网一道奇景。他们想大声说话，但不想让人知道他/她是谁。这是当下相当一部分青年的心理需求。

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。几十年后或者几百年后回头看，当下可能会是一个更深远未来的庞大序幕，它连通着类似于“机械飞升”或“数字生命”这样的科幻概念。而且，不能说没有表现出一些昭示性的状态：人们在网络上不断发明个人的语言，使这些个人的语言进入公共话题；在庞大的技术力量面前，个人依然找到了突破的渠道，发出自己的声音。这些创造性活动，成为了青年或者说人类的新的生活方式。

新时代已经到来，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考虑“传统与现代”这样一个话题。这个话题在每个时代的

节点都被青年反复讨论。青年如何理解传统、如何对待传统，间接决定了传统以怎样的形式在我们生活中苏醒。其实，传统若是作为一种娱乐的和审美的活动，在青年中还是很受欢迎的。比如当下的寺庙里，有很多年轻人，他们做完一些符合寺规的祈愿之后，喜欢在古制的建筑前留影。那一刻，他们是与一种过去的生活、过去的范式相融的。把好看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只是目的之一，他们选择寺庙这个场景，其实已经是经过审美上的取舍。

青年人现在会去从事很多与传统相关的文娱活动，但大多都是以愉悦自己为前提。青年和他们的父辈虽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，但处于两种语境。上一辈人期望用传统习俗去维持一个可控的生活，展望一个可预测的未来，但青年人更期待用传统习俗来让自己高兴起来。这一切的变化是温和的，而不是像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激烈。因为每个时代人们面临的使命不一样。文学里那种传统的对抗性也在消散，比如弑父。以前要弑父，是因为父有绝对的话语权，现在年轻人拿着手机，在信息掌握上是超越父辈的。所以父辈还没有被反抗，就已经走下了太师椅。

我们的部分传统习俗里，家长制的幽灵并未散去。这些是不受当下青年欢迎的。当那种森严的、规整的顺序失效之后，传统中吃喝玩乐的部分、可爱的部分保留了下來。

在我家乡温州，订婚结婚的时候，会做一对糖金杏。什么是糖金杏呢？金杏是温州方言，就是石榴的意思。糖金杏就是把白糖熬煮到浓稠，然后用模具压制成石榴的外形。结婚用的糖金杏很大，一座糖金杏够几十个小朋友分食。它在物质缺乏的时代不仅好吃而且有象征意义，现在，把白糖做成这样的大型器具，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，它变得大而无边。但是这个传统依然保留了下来。为什么呢？我想，是因为它无害。糖金杏是可爱的无害的，那么这样的传统文化，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摧毁它。

文学的其中一个功用，或者说意义，就是解释当下，并以先锋的姿态给出一些永恒性的叙述。我们对当下青年的观察，以及观察他们对当下时代的观察和回应，给写作带来了许多新的启示。总说文学走到末路了，我认为远没有走到末路，文学还大有可为。我们时下的写作，对我们所处的时代，尤其是青年的生活，还有进行充分的解释。写作者的任务还很重，继续写就是了。

好好凝视作为时代横切面的自己

三三



在“新文化与新时代青年写作”座谈会上，许多老师都谈到一个问题，青年作者如何与时代进行联结。众多意见蜂拥而来。这种纷纭很有趣，使我感到一种关于文学的招魂术，而法术背后还暗含着祈祷。但从自身出发，我想说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其实有些困难。经验的反刍需要时间，一个人始终是滞后于他的时代的。假如在未能真正消化前，急着去书写时代，得到的必定只有肤浅的形式。它所导向的是时尚，而非文学。

我特别喜欢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里的一句话，与时逐而不责于人。这句话气势如虹，简直有《逍遥游》一般的魅力。它提出了一种超拔的可能性，人可以直接与时代竞速。有谁做到了这一点呢？《货殖列传》说的是范蠡，范蠡掌握经济规律，能一次次通过这种竞速而获得财富。然而，文学与经济是截然不同的。文学无须与时代竞速，它真正所要抗衡的是纯粹的时间，它是一种试图无限接近永恒的技艺。

此外，我想谈一谈孤独。我在小说集《晚春》的日记中写过孤独，这是一种困扰我许久的感受。我舅舅在1993年出国，他的房间便被我占据。我由此找到了各种磁带各种书籍，还有他满怀好奇走过的各个地方的门票。尽管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我已经过早地被照亮了。后来回想起来，我忽然理解了陈子昂说的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是怎么回事。因为感受何其丰富，以至于溢出了语言的范畴，没有办法与任何人交流。所以对那个拥有感受的人而言，他得忍受自己已经明白的东西。而当我从事写作之后，我更意识到，语言是一种有缺陷的工具。戴维·洛奇在《小世界》里安插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：语言是一种密码，在交流中，我们试图用更多的密码去解密，形成一种古怪的误解循环。我的观点和他相似，比如我们此刻坐在一个房间里，房间里存在的一切(无论是物本身还是物彼此之间的气场关联)就像我们的感受。当我使用一个词语去讲述感受时，就像拿起面前的一支笔，除了这支笔之外，所有的房间内的其他存在都被抹去了。这是一种简化，但语言又是那么基本的一种工具，我们没法不去用它。这就导致，人无法被完整地传达，我们总是用语言抛出自己的碎片，然后遭遇盲人摸象一般的理解，最后指向的当然是孤独。

我所说的孤独，其实是一种相对中立的状态。有一回在上海开会，很多前辈、朋友到来，喝酒与闲聊都非常快乐，至少在现场的时刻每个人都是饱和的。但当我回到房间，一个人独处时，我突然意识到这种众声喧哗的友谊与文学并没有直接的关联。只有回到自己的内部，才能与文学通灵，感受一点点被恢复。或者说，文学——至少在被写下的那一刻，无疑是孤独的，是无法借助任何他者之力的。我最近在读海伦·麦克唐纳的《在黄昏起飞》，作者拥有一双可以与动物对视的眼睛，书写了各种对自然界的观察。其中有一个对自然现象的书写，打动了食。作者自述在20岁出头的年纪去看一场日全食，那时她很年轻，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。日全食发生时，月亮、太阳在她的两侧，连成一条穿过她的直线。总之，她把日全食当作一种私密的盛宴，想独享这种珍贵的时刻。但是，当日全食真的发生时，她震撼到颤抖，并发现这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占有的时刻。读到这里，我突然察觉一种可能性：“孤独”可能只是一种幻觉，人类在不自知地被一些超越自身的力量所照拂。

我曾经有过和海伦·麦克唐纳近似的想法，我想独享生活中最珍贵的经验，把它们放进一个内部的抽屉，拒绝作为小说题材去书写或展示。这是一种比较幼稚、固执的想法，但最近机缘巧合破除了这种执念。那个时刻仍然和我舅舅相关。舅舅是

我们家族中唯一一个具有文学气息的人，他会读大量书，以非常简朴、智慧的方式躲藏在他的各种身份背后。我自诩是了解他的，也想和他有所交流。但我们是亲戚，并不是朋友，很难破除中国式家庭内人与人之间的屏障。偶尔见面，也只能聊一些日常的话题。非常罕见地，我们也会交流到一点精神层面的事，虽然并不直接。比如我每次出去玩，碰到古怪的礼物(比如永远无法拿起的带刺的刺球)，都会买来送给舅舅；比如舅舅会建议我去一次意大利，他讲述从那不勒斯到威尼斯的那段路多么美，连他都想写小说了；比如他会在半夜忽然给我发一个他26年前在孟买买的面具。我曾以为，在我更成熟的时候，我可以和舅舅就精神的困惑有所交流。然而，2018年，也就是舅舅52岁那年，他因心肌梗死早逝。在他去世之后的某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每一次微弱、别扭的靠近，正是我想要的交流。我以为自己尚未做好准备，但事实上，这种交流已经发生过了。这种认识让我的观念有了变化。有段时间，我决定把舅舅的故事当作宝藏埋在自己的内心，想震撼强烈，也不会用文学去讲述它。但在我想明白之后，我知道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东西，是和自我相关的“真”。与此同时，我也被一个发现所震惊：其实有很多超越孤独的力量在照亮我们，那和生命与存在本身息息相关。

最后，我想以自己的一场梦结束这篇文章。有一天，我梦见自己成为了一个视角，我在一个女癌症患者的内部(我清楚地知道她不是我，我只是一个视角)，我能感受她在掉头发，她的生命正在衰弱，为此非常焦虑。到梦的结尾，我变成了一个外部视角，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病房中央的秋千上荡秋千。这感觉非常古怪，尽管我无意识地为她的凋敝而恐惧，但我彻底沦为一个视角，失去了生命。醒来之后，我反思了这个梦，它与我的写作是息息相关的。长期写作使我更擅长进入别人的体验，而忽视了自我的存在，压抑了自我的欲望。它也可以回答文章开头的问题，我们应该先解决自己和自我的关系，回到最真实的感受上，那样才有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。因为写作者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，是时代中微不足道的碎片。只有好好凝视作为时代横切面的自己，并用文学的形式将其表达出来，才有可能真的抓住时代的影子。这是我暂时找到的答案。